

# 疑古、釋古與重寫思想史

● 梁 濤



何炳棣：《有關〈孫子〉〈老子〉的三篇考證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2）。

1972年，英國劍橋新學院教授格芮非司(Samuel B. Griffith)為翻譯《孫子兵法》，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詢問有關《孫子兵法》的年代等問題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

在來函上作了批示，表達了《史記·孫武傳》不可靠、《孫子兵法》是戰國時期著作的個人看法，並安排年已八十歲的顧頡剛書面答覆。二十天後，顧頡剛做出了回答，據筆記，其結論是：

《孫子》決不作於春秋時。既不作於春秋時，即與吳軍攻楚入郢無關，《史記·孫武傳》全不可信。……我們可以猜想：前三四一年，齊伐魏救韓，田忌為將，孫臏為軍師；其後田忌奔楚，楚封田忌於江南，江南即吳境，說不定孫臏跟了田忌去，就在那裏寫出他的兵法。後人弄錯了時代，說他是春秋時人，另外造出一個幫助闔閭伐楚的孫武來，這故事就為司馬遷所採取了。

顧頡剛的這項結論可以分析為三項：一、《史記·孫武傳》全不可信；二、《孫子兵法》決不作於春秋時，而成書於戰國時期；三、《孫子兵法》的作者猜想是孫臏。然而在一番駕輕就熟的辨偽工作後，顧

1972年，英國教授格芮非司詢問《孫子兵法》的年代等問題，顧頡剛做出了回答，據筆記，其結論是：「《孫子》決不作於春秋時。……《史記·孫武傳》全不可信。」然而該年4月山東銀雀山出土的《孫子兵法》與《孫臏兵法》竹簡，不僅完全推翻了顧頡剛等人對《孫子兵法》及《史記·孫武傳》的種種懷疑，而且引發了人們對疑古派古籍辨偽方法的深層反思。

古史辨派辨偽古史的指導思想是「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」，其又表現為：一，對古代文獻一概存疑。二，以故事演繹的方法對「偽史」的成因進行解釋說明，把有獨立來源的文獻記載看成故事流變中的不同版本。這套辨偽方法雖盛極一時，但其基礎卻是脆弱的。70年代以來不斷出現的考古發現，不僅一次次證偽了古史辨派的具體結論，同時暴露出其方法論上的嚴重不足。

顧剛忽然感到一絲不安，他在這條筆記的末尾寫道：「聞今年山東某地出土木簡《孫子兵法》，視今本倍多，不知何時可見到。1972年8月23日陳金生君來談及。」<sup>①</sup>顧先生這裏所說的正是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同時出土《孫子兵法》與《孫臏兵法》竹簡的大事，這次發現不僅完全推翻了顧頡剛等人對《孫子兵法》及《史記·孫武傳》的種種懷疑，而且引發了人們對疑古派古籍辨偽方法的深層反思。

眾所周知，古史辨派辨偽古史（包括古籍）的指導思想是「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」，從這一思想出發，其辨偽古史又表現為：一，對古代文獻進行「有罪推定」，一概存疑。二，以故事演繹的方法對「偽史」的成因進行解釋說明，把有獨立來源的文獻記載看成故事流變中的不同版本（上文關於孫武被誤傳為孫臏的說明，即是典型一例）。古史辨派的這一套辨偽方法雖盛極一時，並產生大量的辨偽成果，然而其基礎卻是脆弱的。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不斷出現的考古發現，不僅一次次證偽了古史辨派的具體結論，同時暴露出其方法論上的嚴重不足。如有學者指出的，中國有規範、嚴密、長期不間斷傳承的史官系統，史書的傳承是非常嚴肅的國之正事，與自由無序的故事傳播不可同日而語，古史辨派用故事的眼光看待歷史，用梳理故事傳播的方式來處理歷史文獻，是混淆了兩種不同的研究對象的結果。古史辨派的另一個不足，是他們對於古書體例和成書情況缺乏了解。近些年大量戰國古籍的出土發現，使人們

認識到古書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長的過程，很多書在寫定前，還有一段口傳的過程，除了少數書籍立於學官，或有官本外，一般都要經過改動變化。同時，由於古人沒有類似後世的著作權概念，古書的「作者」、「述者」還有「撰人」，時間可以拉得很長。因此，古書形成時間的遠近與歷史真實之間並沒有必然關係<sup>②</sup>。古史辨派簡單用古書出現的「早晚」來判定歷史事實的「真偽」，難免會以偏概全，製造出種種「冤假錯案」來。因此，古史辨派的失誤並非個人的偶然原因，而是其方法論導致的必然結果。其實在我看來，所謂「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」是只可以作為一個思想史的命題來看待的，即人們對歷史事實的回憶、記錄、認識和描述往往因觀點、立場的不同而不同，歷史事實的「意義」和「價值」是層累地造成的，這即是孔墨「俱道堯舜，而取捨不同」的原因所在，而古史辨派由這種記錄、描述的不同，轉而懷疑事實本身的「有無」和「真偽」，這可以說是導致其片面「疑古」，並最終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走出「疑古」，並非要重新回到「信古」的老路，也不是要放棄對史料的審查，而是要對審查史料的方法進行調整，這種調整主要表現為：一、由「有罪推定」轉變為「無罪推定」，承認古代文獻是在長期的傳承中形成的，其中雖有某種「變形」、「失真」，但應是基本可靠，是我們研究古史的前提和必要條件。二、由控告方轉變為審判方，以「法官」客觀的身份對史料的真偽進行裁決。這裏古史辨派的成

果可以重新拿來作為「控詞」，但允許被告有申訴的權利，凡申訴成功即無罪，反之則有罪。三、二重證據法。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，重證據，不重推理。如果以上概括不錯的話，這應該就是活躍於當今史壇、代表了史學發展方向的「釋古派」的「辨偽」方法。令人可喜的是，這一方法已被一些前輩學者運用到古史研究的實踐中，何炳棣先生近年關於《孫子兵法》一書的考辨，就是一個具體例證<sup>③</sup>。

## 二

本來對於孫武和《孫子兵法》，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有明確記載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也分別列有《吳孫子兵法》和《齊孫子》，但是由於屬於孫臏的《齊孫子》隋唐以後失傳，由此引起人們對孫武和《孫子兵法》的種種懷疑。據顧頡剛的總結，人們懷疑《孫子》一書的主要理由有：1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述吳國事甚詳，而不載孫武；2、成書於東漢的《越絕書》也很少記載孫武；3、《孫子》所述為戰國戰術，非三代戰術；4、《孫子》講權詐，與春秋時講禮義不合；5、春秋時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，《孫子》稱吳國「興師十萬」、「出征千里」，不可信；6、春秋時各國都由卿率師出征，沒有專任將軍的，《孫子》多次提到「將」，與春秋制度不合；7、孫武以婦女實驗兵法不可信；8、春秋時大夫的家臣稱大夫為「主」，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以後才稱國君為「主」，《孫子》稱國君為「主」，說

明此書作於戰國時；9、《孫子》內容與《戰國策》中所載孫臏之言相似，說明孫子即戰國時的孫臏；10、《孫子》有〈勢篇〉，而《呂氏春秋·不二》說「孫臏貴勢」，說明孫子即戰國時的孫臏；11、弩的使用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左右，而《孫子》中正有弩的記載。可以說，《孫子》一書之所以長期受到質疑，就是與以上的「指控」相關，但這些「指控」是否有事實根據，是否經過了必要的審查工作，卻是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。其實，稍一分析就可以發現，以上「指控」有些使用的是所謂的「默證」，有些則是無意義的主觀聯想，根本不足為據；其中似乎較有說服力、且被人們反覆引證的主要是將的職權功能、戰爭規模等各項，但若細加審查，其可靠性同樣存在問題。

比如，古今學人或以為《孫子》所論的「將」是能決定全部作戰策略，享有統一指揮權力，承擔全部勝敗責任，十足專業化的將軍，大異於文武不殊途、將帥共決策的傳統，所以《孫子》應該是戰國時代的著作。但何炳棣先生通過分析漢語無時態變化的特點指出，「所有《孫子》論將的詞句決不能以通常陳述語氣去解釋，必須以建議、要求的語氣去理解；而建議和要求的對象就是勇於創新的君主」；「孫武對將的理論與主張既有異於春秋的傳統，又預期戰國二百年間的巨變；它所代表的時代過渡性是相當明顯的。《孫子》久已被舉世公認為古代軍事最經典之作，其中論將的部分最能明示孫武的先驅認知。」<sup>④</sup>可見以上「指控」之所以有誤，是將

《史記》對於孫武和《孫子兵法》有明確記載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也分別列有《吳孫子兵法》和《齊孫子》，但是由於孫臏的《齊孫子》隋唐以後失傳，由此引起人們對孫武和《孫子兵法》的種種懷疑。比如，古今學人或以為《孫子》所論的「將」是能決定全部作戰策略、十足專業化的將軍。但何炳棣指出，「所有《孫子》論將的詞句決不能以通常陳述語氣去解釋，必須以建議、要求的語氣去理解」；孫武對「將」的論述是預言性、前瞻性的。

一些學者見《孫子》中有「革車千乘，帶甲十萬」、「興師十萬，出征千里」等語，便推論《孫子》一書完成於戰國時，因為他們認為春秋時代的戰爭遠沒有達到「興師十萬」的規模。但藍永蔚指出：「戰國中期以後，……參戰各方的軍隊一般都在二、三十萬以上，遠非《孫子兵法》的『十萬之師』所能望其項背。可見《孫子兵法》中所展示的作戰部隊的規模是與春秋末期的戰爭實況相一致的。」

思想創造混同於一般的事實描述，忽視了思想的預言性、前瞻性。其實思想家的最大特點，是其能敏銳地觀察到事態的發展，並提出相應的建議和主張，故其思想主張往往要經過較長一段時期，才能逐漸被社會所接受，孫武對「將」的論述正是這種情況。試想，若《孫子》是完成於「將」的專業化已完成的時代，其中關於「將」的種種論述和要求豈不成了喋喋不休、毫無新意的陳詞濫調？又如何能顯示出獨特的軍事價值？又如何能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，以至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」？

又比如，一些學者見《孫子》中有「革車千乘，帶甲十萬」、「興師十萬，出征千里」等語，便推論《孫子》一書完成於戰國時，因為在他們的印象中，春秋時代的戰爭遠沒有達到「興師十萬」的規模。但我們只要對史實作一番審查，便會得出相反的結論。例如春秋中期的城濮之戰（前633年），晉軍已出車達七百乘，合士卒五萬二千五百人（按杜預的計算方法，下同）。到了春秋末、戰國初期，軍隊的規模進一步擴大，如稷之戰（前505年），秦楚聯軍出車約一千乘，合士卒七萬五千人。這還不包括後勤徒役，若按每乘革車有徒役二十五人，千乘二萬五千人計算，則稷之戰秦楚聯軍的總人數恰好是十萬人。所以對春秋步兵有深入研究的藍永蔚先生說<sup>⑤</sup>：

春秋中期的戰爭規模還比較小，……而戰國中期以後，戰爭的規模則變得十分龐大，參戰各方的

軍隊一般都在二、三十萬以上，遠非《孫子兵法》的「十萬之師」所能望其項背。可見《孫子兵法》中所展示的作戰部隊的規模是與春秋末期的戰爭實況相一致的。

可見以上「指控」之所以無效，主要是忽略了必要的審查程序，而「審判程序」不合法，其結論自然也就不合法了。

在對《孫子》的各項「指控」逐一進行審查之後，何炳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「《孫子》十三篇和《吳問》都可確定是撰成於吳王闔廬三年，孔子時年四十」，「《孫子》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。」<sup>⑥</sup>這個結論看似出人意外，實際卻已隱含在各種文獻記載之中，只不過由於種種成見，人們對其視而不見罷了。我們今天重新接受這一結論，並不是因為有了甚麼新的證據——如果司馬遷的記載證據不足的話——也不僅僅是因為銀雀山竹簡的出土增加了我們對孫武作《孫子》的信心，而是因為我們實在拿不出《孫子》不是孫武所作的證據。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，我們與其隨意猜測，任意聯想，不如相信司馬遷的記載是可靠的。大史學家司馬遷不僅比我們更接近他所記錄的時代，而且還擁有大量我們不可能擁有的資料、信息來源，在拿不出證據的情況下，我們有甚麼理由置他的記載於不顧，而憑藉自己的演繹、推理來重新對歷史進行解釋和說明，實踐已經證明這其實是極容易犯錯誤的。

在討論《孫子》的成書時，頗為流行的「集體創作說」也值得注意。一些學者雖然承認司馬遷的記載，

但又受「春秋無私家著述」的影響，認為《孫子》一書不可能是由孫武個人完成，而應是「孫子學派」軍事思想的記錄，其成書經歷了從春秋末期到戰國中期的較長時間。然而如我們前面所說，古書的形成往往有較長的一個過程，經過了許多人的傳抄、記錄、整理，如果說《孫子》一書經歷了這樣的形成過程，那麼這不過是古書的通例，沒有甚麼特別之處；但如果說許多人都參與到《孫子》的創作中，那麼則是大有疑問的。讀過《孫子》的人，都會感到其風格的統一和聯繫的緊密，這些都是《管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之類的「集體著作」所不具備的。「集體創作說」的邏輯是，像《孫子》這樣具有創造性和思想價值的著作，決不可能在那麼早的時間由個人來完成，所以要拉長其創作時間，增加創作人數。然而思想的突破並不完全取決於時間的早晚和人數的多少，而是需要某種機緣，甚至是天才人物的出現，那種「直線式進化模式」並不符合思想發展的一般規律。其實真正的思想創造都是個人化的、不可重複的，如果沒有李白、曹雪芹，就決不可能會有那些千古吟唱的佳句和文學瑰寶《紅樓夢》，同樣，沒有春秋末年的孫武，也就不可能會有舉世公認的軍事經典《孫子兵法》。

### 三

如果說歷史上關於孫武的記載相對一致的話，那麼老子的情況則較為複雜，這也增加了問題的難

度。古籍中關於老子至少有以下線索：一、老子為周守藏史，年紀長於孔子，孔子曾向其問禮，見於《史記》、《莊子》以及屬於儒家的《禮記》、《孔子家語》等；二、太史儋即老子，但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」。三、老子之子名宗，為魏將，封於段干；宗之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，假之子李解西漢時為膠西王卬太傅，見於《史記》所記老子後代的世系。那麼，以上線索哪個更為可靠、更有理由作為我們的依據呢？在我看來，顯然應該是第一點。這不僅是因為司馬遷主要傾向這種觀點，而且它還見於儒家的《禮記》、《孔子家語》等著作中，這就更值得我們重視。曾有學者以《禮記》、《孔子家語》晚出為藉口，否認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可靠性。然而他們所謂晚出的漢代正處於「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」（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）的形勢，此時的儒生有何必要「揚彼抑己」，編造出自己的宗師問禮於老子的故事呢？其實，這些記載之所以保留在儒家典籍中，正說明孔老的關係和交往是有事實根據，連後世儒生也無法否認的，儘管這種「事實」在流傳中會出現某種「變形」和「失真」。

至於第二點，雖說並非完全沒有根據，但可信性顯然較小——司馬遷也不傾向這一觀點——很可能是由於老子（名聃）、太史儋二人身份、名字的相近而造成的混淆和誤傳。學術史上影響頗大的「《老子》戰國說」，雖也與這一線索有關，但學者論證的依據卻往往是「思想線索」、「文字文體」、「時代術語」

歷史上關於老子的情況更為複雜，古籍中關於老子至少有以下線索：一、老子為周守藏史，年紀長於孔子，孔子曾向其問禮；二、太史儋即老子；三、老子之子名宗，為魏將，封於段干。曾有學者以《禮記》、《孔子家語》晚出為藉口，否認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可靠性。其實，這些記載保留在儒家典籍中，正說明連後世儒生也無法否認孔老的關係和交往。

何炳棣相信「《老子》戰國說」，他從《史記·老子列傳》中老子後代世系這一線索入手，推測該世系可能是青年司馬談留學齊都期間，親獲自李耳八世孫、膠西王卬太傅李解者，並由此推論，李耳約生於公元前440年，《老子》約完成於公元前360年。但是，老子的身世撲朔迷離，而其後代的世系卻言之鑿鑿，這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。更何況，李解所言的可靠性是可以由他自己來證明的嗎？

等內在證據，然而這些「證據」其實也是未經審查、證明力有限的。張煦曾針對梁啟超〈論《老子》書作於戰國之末〉一文的指控答辯道⑦：

查原告所稱……仁義二字是孟子專賣品……《易·繫辭下傳》說：「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。」《左傳》說：「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義也；以君成禮，弗納於淫，仁也。」仁義為並文，與老子所說「絕仁棄義」，「先仁而後義」有何不同？……

原告說某諸侯在春秋後若干年始稱王，才能「王侯」（《老子》或本作「侯王」）、「王公」聯用，那話從何見得？考吳子壽夢在《春秋》絕筆前一百零四年已稱王，稍後越亦稱王，楚更在春秋前稱王。老子原籍與楚接壤，或後竟為楚人，豈有不知楚王？在周做官，豈有不知周王（夏商周皆稱王）？何以孔子同時的老子，不會用它？《易·蠱》之上九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，不是早已「王侯」聯用嗎？《易·坎象》「王公被險以守其國」，《離象》「六五之吉離王公也」，不是「王公」連用嗎？

其辯護可謂痛快淋漓。郭店簡《老子》出土後，其中的「絕聖棄智」、「絕仁棄義」寫作「絕智棄辨」和「絕聖棄詐」，證明《老子》一些啟人疑竇之處，乃是文本變動的緣故，與其成書早晚並沒有直接關係。何炳棣先生是相信「《老子》戰國說」的，但他顯然注意到思想、文句等證據的局限，於是改從《史記·老子列傳》中老子後代世系這一線索入手，經過詳細考辨，推測該世系可

能是青年司馬談留學齊都期間，親獲自李耳八世孫、膠西王卬太傅李解者，並由此推論，李耳約生於公元前440年，《老子》約完成於公元前360年。何先生的這個考證，多少讓人感到疑惑。老子的身世撲朔迷離，而其後代的世系卻言之鑿鑿，這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。更何況即使如何先生所言，老子後代的世系是司馬談親獲自李解處，也不能證明這個世系就一定可靠，難道李解所言的可靠性是可以由他自己來證明的嗎？要知道當時人們為了攀高枝而造偽，實在是普遍現象。另外，何先生似乎也沒有充分考慮到郭店簡《老子》的年代問題。據發掘報告，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四世紀中期至前三世紀初，有學者據相鄰墓葬推斷為公元前300年左右，郭店《老子》的抄寫當在此之前。若按何先生所說，《老子》是完成於公元前360年左右，那麼在短短五六十年裏，《老子》要經歷完成、流傳、抄錄、下葬等一系列過程，這在通訊不發達的古代，雖說並非完全不可能，但可能性顯然極小。除非何先生相信郭店《老子》只是一個原始的傳本，今本《老子》是太史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成的。但這種看法也存在着種種疑問，如果何先生堅持此說，似也應給予必要的論證和說明。

近年來隨着簡帛材料的大量湧現，重寫學術史、思想史的呼聲愈來愈高。但思想史如何重寫，則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。這裏，重視實證，還是相信某種思想的理念、邏輯，不僅會導致不同的寫

法，而且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思想史的理解。何炳棣先生坦承，自己是受了李澤厚古代中國辯證思維源於軍事經驗，《老子》將《孫子》的軍事辯證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學觀點的啟發和影響，並以「從繁瑣的考據以求證成《孫》為《老》源」，為「義不容辭的職責」。那麼這個已存在的先入之見，有沒有可能影響甚至左右了何先生對證據的選擇與判斷？這樣講恐怕並非只是一種推測之詞，比如，何先生十分重視張岱年「郭店《老子》更像是摘抄本」的觀點，並評論說，「七十年來張先生一向認為《老子》是系統性極強的一本專書，不是纂輯，而近年居然有了很大的改變。這是《老子》研究上很有意義的新趨向。」<sup>⑧</sup>其實，張先生的「郭店《老子》更像是摘抄本」，是說在郭店《老子》前已有個類似今本的《老子》存在，郭店《老子》是它的摘抄本，這等於承認《老子》成書較早，且是「系統性極強的一本專書」，張先生的觀點不僅不能支持何先生，而且甚至與其相反。何先生對張岱年觀點的不恰當引用，正是某種先入之見干擾、影響了其正常思路的表現。這裏願提出一個不成熟的想法，求教於何先生及各位讀者，中國古代辯證思維來源於《周易》古經，孫子將其運用到軍事領域，老子則發展到政治、社會領域，《孫》、《老》是一種同源共生關係，而不一定是時間的先後關係。另外，《孫子》是一部兵書，由於要游說君王，所以可能形成較早；《老子》則是一部哲學書，其內容起初只在少數人中流傳，所以可能與《論語》一樣，也是由老子的弟

子、再傳弟子編纂而成，但大概在戰國早期已完成。不知何先生以為然否？

### 註釋

① 顧頡剛：〈劍橋格芮非司來詢《孫子》書之年代〉，載錢谷融主編，印永清輯：《顧頡剛書話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161-65。

② 參見李學勤：〈對古書的反思〉，載復旦大學歷史系編：《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）；李零：〈從簡帛發現看古書的體例和分類〉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，2001年第1期。

③④⑥ 何炳棣：〈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：《孫子兵法》〉，載《有關〈孫子〉〈老子〉的三篇考證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2），頁37-69；42-44；68-69。

⑤ 藍永蔚：〈《孫子兵法》時代特徵考辨〉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，1987年第3期，頁194。

⑦ 梁煦：〈梁任公提訴《老子》時代一案判決書〉，載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冊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），頁316-17。

⑧ 何炳棣：〈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：《老子》辯證思維源於《孫子兵法》的論證〉，載《有關〈孫子〉〈老子〉的三篇考證》，頁28。

重視實證，還是相信某種思想的理念、邏輯，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思想史的理解。何炳棣自言受了李澤厚古代中國辯證思維源於軍事經驗，《老子》將《孫子》的軍事辯證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學觀點的啟發和影響，並以「從繁瑣的考據以求證成《孫》為《老》源」，為「義不容辭的職責」。這個先入之見可能影響甚至左右了何先生對證據的選擇與判斷。

梁 濤 男，1965年出生。1996年於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獲博士學位，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副研究員。著有《〈熹書〉評注》、《中國先秦學術思想史編年》及論文多篇。